

服。……至十八日,主教知期已届,即告辞德、华二公,二公同献葡萄酒数杯,敬饮而别之。……至手出铐后环转行视一次,即将上绑,当面掷预带一包银钱五圆于地上,此中必有深意,予想或系效圣西比里亚诺致命时嘱其徒与刽子员银七十之意。……凡遇教友,无不笑容视之。行至致命之地,刽子云:今宜跪下,主教为诵经未毕,向说少待。后因石地崎岖,退后一步而始跪,时笑向刽子云:我要升天。彼用手取其小帽而轻点圣肩曰:我欲随汝。主教双膝跪地,惟受一刀而斩矣。……论监斩本该候官县,而侯官县因知冤屈,假病不出,故上司即委闽县,闽县无奈同去,惟见其眉头不展,脸带忧容焉。收圣血者,系教外人,姓陈名意元,信德即坚,毫无惊惧。^①

白多禄被杀后,四名被判斩监候的外籍传教士,被关在狱中两年,一直未等到正式执行的命令,直到乾隆十三年九月七日(1748年10月28日),按《流血记》载,是福建巡抚潘思榘自行决定将在监四人,在监中处决。^②但按官方档案记载,是乾隆皇帝下密旨,由署理湖广总督新柱在赴任途中,写了一封信传达旨意,于是潘思榘就派出刑役将四人分别在狱中闷毙及勒毙。^③

这件发生在乾隆十一年教案,影响是相当大的。方豪称之为是乾嘉时期“全国教难,均此案所引发”,^④未免言之过当,但当时此案确曾引起乾隆皇帝注意,他发布上谕称:

天主教久经严禁,福建如此,或有潜散各省,亦未可知。可传谕各省督抚等,密飭该地方官,严加访缉,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,聚众诵经者,立即查拿,分别首从,按法惩治。其西洋人,俱递解广东,勒限搭船回国,

① 《福安遭难事实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53~154页。其中叙述与《流血记》不同,因记述者亲眼所见,采纳其说。盛若翰所记与《福安遭难事实》大致相同,《福安遭难事实》应为其阅读过的文本。

② 郑天祥编译《流血记》,第144~145页。

③ 《闽浙总督喀尔吉善、福建巡抚潘思榘奏为遵旨办理传教西洋人各案折》,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》第一册,第163页。

④ 方豪:《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》第三册,公教真理学会,1973,第104页。

毋得容留滋事。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，容留不报者，该督抚即行参处。^①

因此在乾隆十一、十二年间，是各省搜捕天主教徒的一个高峰期，也因此造成了乾隆十二年苏州严重的教难。此部分非本文重点，其他相关论文亦有报道，故略而不论。

三 福安教案的相关资料

(一) 个别资料

与 1746 年福安教案有关的重要资料，先分别介绍如下：

1. 福建巡抚周学健及相关官员的奏折。此类官方档案搜集于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》中，由于这些重要奏折的出版，大量补充了禁教时期天主教史料的空白，藉由这些档案，可以看到周学健所描述及理解的天主教及福安地方天主教的情形。在撰写本文时亦参考了《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》，但发现其内容与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》雷同，故未在引文中出现。

2. 福安地方搜拿教士教友及审理的相关禀文。这些基本上亦为官方档案，但属于层级较低，在福建省范围内处理的公文，搜集于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。这类文书非常难得见到，常见档案多属于省至中央层级。透过这类低一层的公文书，一方面，可以得知 1746 年福安教案的更多处理过程，也可作为比对的基础。在本文的撰写中，这一些资料的重要性最高。另一方面，这些资料能在欧洲出现，是因为教会方的保存，难免会引发公正性及真实性的怀疑。但比对其文字及叙述后，个人觉得不必有此类怀疑。

3. 《流血记》。针对此重大事件，道明会方面搜集了各种资料，调查事情的背景、经过、影响等，然后由阿里亚斯(Evarilo Fernandez Arias)神父撰写成 *El Beato Sanz y compañeros martires del Orden de Predicadores*, 1950 年时

^① 《乾隆实录》卷二六九，乾隆十一年六月庚寅。

中国籍的道明会士郑天祥以此书为底稿写成《流血记》。按书中说法,此书主要是依据德方济各在狱中持续对福安教案的报告写成,自然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4. 其他教会方报道。身在澳门的盛若翰,针对 1746 年福安教难及其影响写了一封信。他似乎在 1748 年底看到了相当多的原始材料,由其写出的教难过程及引用的材料,因其翔实可推论文中所言虽在其他资料未见者,亦有可信度。另有两篇记载教友遭难经过的文章《报诸友单》及《福安遭难事实》,都是经调查后写于 1747 年的报告,也相当具有参考价值。至于冈萨雷斯(Jose Maria Gonzalez)所写的 *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* 第二卷,有近百页篇幅都在描述福安教案,惜本人不谙西班牙文,仅能少量参考运用。

(二) 互补及比对

每一种资料都代表一种观察福安教案的视角。首先,这些观察者看到的、听到的或从文件上读到的事情不完全相同;其次,观察者也有他们自己的主观立场;再次,他们在上述的条件中,选择要如何叙述这件案子给他们的读者。因此,当我们在阅读这些资料时,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叙述的经过,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立场,还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选择。

例如福宁府知府董启祚在此案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,若仅据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中所收藏董启祚的通禀,会以为此案发起于乾隆十一年五月初十日;但若用《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》中周学健的奏折,可以知道乾隆十一年四月,董启祚即已有通禀,但其时董启祚不知福安有西洋人,只是以雍正年间查获之守贞女为天主邪教之证。由此延伸出一个想法,如果只是为了福安地区因信天主教而有守童贞的女性,董启祚值得大张旗鼓清除此一天主邪教吗? 福宁府如果不知道上级态度,难道不怕马屁拍到马脚上吗? 妇女守贞不嫁是否是中国社会习俗中的大忌? 福安当地是少数民族畲族聚居之地,汉畲风俗不同,地方官值得拿妇女守贞不嫁做文章,然后引发地方紧张气氛吗? 更何况佛教女性出家为尼,是一千多年已有之习……似乎答案并不那么单纯,由此综合判断,董启祚的行为不合

理,除非他是受命于周学健。周学健可能基于一种公平对待其辖下各地风习的态度,不方便主动对风闻的福安天主教动刀;董启祚得了上级指示或暗示,于是上禀处理福安天主教。周学健有了地方状况为依据,就可按其心意处理他认为伤风败俗、居心叵测的天主教。只是没有想到在密访调查的过程中,居然发现当地有西洋人潜藏,更为兴奋的周学健,于是大张旗鼓,难得一见地动用军队进行搜查。

周学健主动性的另一个证据是,乾隆藉上谕告诉周学健及各省督抚处理天主教原则。这个原则有二:一是要确实清查天主教;二是查获的西洋人,驱逐出境。我们可以推论军机处拟出的这个上谕时,衡量过在北京有西洋人在朝廷服务,也有其一贯对待天主教的原则。这个原则是先帝雍正所订,原则是天主教是夷人小教,不可在中国传播,但并非白莲无为一类的邪教。地方督抚接皇帝上谕,自有师爷幕友为其分析上谕缘由,为官之道理应按此原则处理,但周学健却不顾前程,再上密折,一定要将白多禄等处死,若不是他主动要打击辖境内天主教,断不至此。

若按《流血记》中的说法,费若望、华若亚敬、德方济各及施方济各在1748年10月28日被处死,是福建巡抚自作主张。这是教会史作者掌握部分材料后的推想。可是根据当时福建巡抚潘思榘收到的密折,是乾隆皇帝命令将他们在狱中秘密处死,虽然此前巡抚确实建议皇帝将传教士明正典刑。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,从教方及官方找到的各种资料经过排列及比对,我们才能进一步更清楚地描述福安教案的确实经过。

在本文之外另有数篇讨论1746年福安教案的文章,其中一篇作者表示“福建官员”认为天主教是:“‘吃教’相诱,建堂立会。……煽动人心,崇奉邪教。……蔓延地方,难以遏制。……扰乱礼法,败坏风俗。……潜藏异心,别有它图。”^①因为作者所用的最主要史料是《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》,因此将这类中央档案里地方督抚的意见,称之为是福建官员的意见。但比对过地方官员的审讯记录,可以发现两次负责审案的“福建官员”,大多和周学健意见不同,可以说周学健在此案中是一意孤行,他曲解供词,甚至是完

^① 郭卫东:《乾隆十一年福建教案论述》,《福建论坛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04年第7期,第59~60页。

全不顾供词,就是要置五名传教士于死地。若长期观察乾隆时期的教案,除了乾隆十一年、十二年两次案件有传教士被杀,主导者皆为周学健外,其他案件中被逮捕的传教士皆被驱逐,即可知 1746 年的福安教案是一件特殊案例,并不具有通案的参考价值。

四 教案分析

(一) 发生教难的原因

从事件本身来探讨,有几种教难发生的可能方向:是否传教活动过于明目张胆,引人侧目?是否教友与教外人关系不善或是发生某种冲突事件?是否有官员仇教,或是朝廷中央严令缉拿?另外,除了这种“事件式”的原因探讨外,也可以从整体结构的方向,思考为何发生此事件。

从事件本身来说,传教士的活动在雍正元年以后,基本上是低调的。原本耸立的教堂没有了,传教士寄居在有能力及有意愿的教友家中。据《流血记》的记载,在雍正五年至八年间,因闽浙总督的态度,也因福安知县仇教,所以在福安地区的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^①一方面,当时华敬、费若望、德方济各皆已在此地传教,已有四处匿避、躲避官兵追捕的经验。他们已历经数次大小教难,经历过宽严不一的地方政府,在一定程度上,传教士的活动应有分寸。另一方面,此案之起是因教友不小心,承平十余年后,松懈了对外人的防备心,竟然将有外籍传教士的情形,告诉了政府官员伪装成的密探。反过来说,在福安地区,教友人数占一定比例,非天主教徒多少知道天主教徒情形,习惯了天主教徒,才会使教徒松懈,轻易使密探得知外籍传教士存在的事实。

所以虽然《流血记》中有缪姓地痞告密情节,但此并非教案主因。福安县官在案发之后遭调职查办,^②可以由此推想平时教友定有管道疏通地方官员,故此事件之发生,系由上级官员发动,与地方无涉,而由其调用绿营官兵查案,可以说是蓄意避开地方官员。是哪一位上级官员,前已分析,董启祚不是主谋,周学健才是主持一切的发动者。

① 郑天祥编译《流血记》,第 57~59 页。《流血记》中所载时间自相矛盾。

② 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 129 页。

周学健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处置天主教,主要是来自于他对天主教的认知。他认定天主教败坏人伦,施行邪术,而且还与外国侵略中国的野心相连,且其做法细腻有组织。虽然他的认知并非事实,但这样的想象牢不可破,以致他将与其认知不同的意见,皆认为不是事实。即使其中一个意见来自军机处,代表乾隆皇帝发言,他都要上奏章辩解,此所以乾隆皇帝对他有“卞急刚愎”的评语。^①除了这个性格上的因素,或许周学健的思想与其人生历程有关,他自雍正元年中进士后,即任翰林院庶吉士,以后一直在京任职,不是身预朝政,就是负文学之责。从这背景看,他没有太多在地方为官的历练,思考方式由上往下多,由下向上少。另一方面他也有儒臣称号,此其以较严格之儒家正统,将天主教看做是与正统相抗的异端小教。在以儒学为正统的情况下,他在审讯过程中所听闻之事,使他非欲铲除天主教不可。一件是自福安移送传教士至福州时,千百教友痛哭送行的场景,他说这些教徒是“不畏王法”,传教士是“悖逆不道”。另一件是陈绶身为生员,在审讯时被法官强令往拜孔子及关帝,陈绶抵死不从,后来是法官胁迫称若不拜孔子、关帝,则要对传教士用刑,陈绶才勉强叩拜,“犹云身拜心仍不服也”。周学健的评语是:“以读书入学之生监,归其教者,坚心背道,至于如此。”因此,周学健一方面想象出天主教的邪魔形象,另一方面又感觉天主教势力庞大,能与儒家正统对抗,因此从维护名教的立场,建构出一场打击异端之战。

周学健惩治天主教的动机,固然是他个人的,与当时多数实际办理本案的官员不同,但在多元文化的中国思想环境中,也可以找到不少人有与其类似的想法。此案发生在1746年,1664年的“历狱”发动者杨光先,对天主教也有类似的想法。

杨光先在他的《辟邪论》中,以汤若望传授之天主教信仰为邪教。

利玛窦之来中夏,并老氏而排之。士君子见其排斥二氏也,以为吾儒之流亚,故交赞之援引之,竟忘其议论之邪僻,而不觉其教之为邪魔也。且其书只载耶稣救世,公毕复升归天,而不言其死于法,故举世缙绅

^① 《清史稿》列传一百二十五。

皆为其欺蔽,此利玛窦之所以为大奸也。其徒汤若望之知识卑暗于利玛窦,乃将耶稣之情事于进呈书像中和盘托出,予始得,即其书以譬之。岂有彼国正法之罪犯,而来中夏为造天之圣人。^①

然后在其《请诛邪教状》中,则认为天主教徒蔓生滋延,为患渐巨。

西洋人汤若望,本如德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,明季不奉彼国朝贡,私渡来京。邪臣徐光启贪其奇巧器物,不以海律禁逐,反藏于朝,假以修历为名,阴行邪教。……又布邪党于济南、淮安、扬州……并京师共三十堂。香山岙盈万人踞为巢穴,接渡海上往来,若望藉历法以藏身金门,窥伺朝廷机密。……目今僧道香会,奉旨严革,彼独敢抗朝廷,每堂每年六十余会,每会收徒二三十人,各给金牌绣袋以为凭验。光先不敢信以为实,乃托血亲江广假投彼教,果给金牌一面、绣袋一枚,妖书一本,会期一张。证二十年来,收徒百万,散在天下,意欲何为。^②

这样的说法,除了时间及人物不同外,在反教的动机上,周学健与杨光先几无二致。

在这相差八十年的两件教案中,可以看出周学健的个别动机,其实是有某种普遍性的。也就是在以儒家为正统的环境里,在天朝观念的自大心态中,同时也是因为缺乏对外国人及外国宗教的足够理解,存在着对不理解事物莫名的恐惧,一些保守刚愎的官绅,持续地以自己的观点,曲解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天主教。

(二)教案中的教友

1. 教友的背景与信仰状态

从被捕获的三十余名教友中,基本上有三大姓氏:缪、郭、陈。被捕缪姓

① 杨光先《不得已》收入方豪编《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》(三),台北,台湾学生书局,1966,第1129~1130页。

② 杨光先《不得已》,《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》(三),第1076~1078页。

男女教友都住穆洋,郭姓教友亦住穆洋。被捕的陈从辉,周学健奏折中称住在福安县城外大北门,口供资料中是“官埔”,此二地相同。另外陈绌亦住穆洋,在溪东有陈廷柱、陈沅、陈喟然、陈樞、陈桢等。此溪东陈姓家族教友,有与穆洋缪姓通婚的例子,缪喜使在口供资料中说他住在溪东。另外有穆阳的刘澡水,是郭惠人表兄弟,王鸚荐亦系穆阳教友。

由这些教友资料可以看出教友彼此常有姻亲关系。而这些教友的信仰皆有数代。^① 雍正元年清查福安天主教时,在档案中提及四名信奉天主教的首事生员陈绌、赵文桐、缪天麟、郭于宣等。^② 陈绌两次被查获,郭、缪两姓可以推断与乾隆十一年的缪、郭二姓应系同一族人。

被捕教友中,陈绌、陈喟然是生员,陈廷柱、陈沅是监生,陈樞、陈桢是武生。这些身份,对于保护在地方上的传教工作有一定帮助。按规定每月初一、十五生员等应至孔庙行礼,看起来这一规定并未严格执行,这些从教士绅并不需要因此而违背教规。

从口供中可以发现,“家族”固然是维系此一信仰的重要因素,但并不保证家族中人皆维持此一信仰。家族虽然提供了天主教存在的环境,但每一个教友也在其生活中,随时要面对非天主教或反天主教的环境。如何“选择”则存乎一心,每人各有判断。例如被捕的陈喟然,他承认自己是教徒,教名叫“多默斯”,但他的口供说他两个儿子陈圣野、陈文野不是教徒。^③ 这口供可能是为他两个儿子的脱罪之辞,但可证明父子信仰状态不同,这在所谓的信教家族中是经常之事。

我们基本上可以设想在福安地区的信教家族中,天主教信仰是流动的,有信仰虔诚的信徒,有信仰冷淡的信徒,也有曾有信仰、但已放弃信仰的非教友。信仰冷淡者或有可能变为信仰虔诚者,也有可能放弃信仰;同样,信仰虔诚者也可能转为冷淡,放弃者也可能恢复信仰。而他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更

① 《福安周县官初审问供》,这次审问的时间是在费若望被捕后,德方济各、施方济各被捕前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66~70页。

② 《福安县查明县内各处天主堂》,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24页。

③ 《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,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19页。

在各种机缘中,形成他们个别的信仰状态,与他们相似或不同信仰状态的父兄同居共处,这才是福安地区教友的实况。

传教士在此教友生活圈中,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,他们是教友群体的领导者。受到外在环境影响的教友若信仰动摇,当他们信服的传教士加以劝慰,往往可以巩固教友的信仰。传教士领导教友固然有其权威,但亦以其本身虔诚的信仰及道德表现说服人。《流血记》中描写白主教在乾隆三年以后回到福安地区,“各堂口经他巡视之后,也都迅速的刷新振作起来。还有一些信德稍有动摇的教友,恭听主教的圣训后,也都翻然悔悟,自动地痛悔告解,再跟教会言归于好”。^① 在福安地区的传教士,除了较年轻的施方济各不一定具有此种威望外,华若亚敬、费若望、德方济各都是为教友尊重的神父,此其能在福安地区,形成具有活力教友群体的重要因素。

2. 教友面对教难的选择

在中国的审讯过程中,用刑似乎为不可少的部分。白多禄已六十六岁,在漳浦县及建宁县会审时,被掌嘴六十五下;至巡抚亲审时,又掌嘴二十五下。施方济各在福安,由范国卿会审时即被夹棍伺候,因其忍痛不叫,被认为有邪术护体,还被以屎尿泼其全身,以破其邪术。^② 除了掌嘴、夹棍外,有吊刑、拶刑、杖刑不一而足。在身体极端疼痛的情况下,受刑者因而会招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内容,也是考验他们信仰最严峻的时刻。

对于中国官府而言,因为认定天主教是邪教,在审讯过程中要求信仰者放弃信仰,特别是要求有生员、监生、武生身份者放弃信仰,是其道德教化工作的一环。经过刑讯后,陈樵、陈廷柱、陈沅三个“犯生”,都宣示放弃信仰。被捕平民中,刘澡水、刘光、缪尚昭、缪高卿、王恩、陈传若、郭仁也都宣布背教。^③ 宣示背教口说无凭,办法是脚踩耶稣像,然后拜关帝神像或土地公,上述背教者皆按此办法求证其所言是否属实。^④ 另有一些教友是一开始问供,

① 郑天祥编译《流血记》,第75页。

② 《抱(报)诸友单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48页。

③ 《福建延平府书成、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、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,会同福州府徐维垣审拟福安天主教事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38~139页。

④ 《抱(报)诸友单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49页。

即否认其教友身份,如担任信差的缪尚禹、缪允喆、陈墨仔、缪允义等。^①从传教士观点来说,这些人如果不是教友,是不会担任信差工作的。

按教友事后搜集资料,女性教友背教者不多,“此案女教友十分信德不屈,仅郭全使一人见背”。^②但这一位被认为背教的郭全使,在另一份资料中说她在审讯时被拶三次,指血淋漓,因其平日仅用福州方言,不懂法官问话,其侄郭惠人教她:“凡官不论问汝何事,汝惟一一点头为是。”后郭全使发现此即承认法官所问,于是一一辩明,然后对法官说:“我惟怕天上之主,至于世间不论什么刑罚,我俱不怕。”还教其他贞女说:“官若问何人教汝守贞,汝等俱答是我为首可也。”^③如果这个记载可信,这些被逮治的贞女是无人背教的。

除了被逮治三十余名教友之外,福安当地也开始设法清查信仰天主教者。按官方资料,“邑民纷纷投首者甚众,应请听其改过,照律免罪。童女俱分别择嫁,如有不首,查出杖惩”。^④一般教友身家与土地相连,如果官府采取严格取缔的手段,逐户清查,教友们在无法逃离时,是选择承认信仰然后被“杖惩”,还是考虑身家性命,然后背教?至少在官方资料中,后者被呈现出来。

在尚若翰的信件中,也呈现出福安教案在全国各地所产生的真正破坏。他写道:“我们以一种极大的痛苦获知,在各地有许多人都有失体面的否认自己是基督徒。”^⑤甚至在某些基督教会口中,大部分人都签署了由当地官吏们起草的背教文书。……有时甚至是那些著名基督徒,都背叛了他们的虔诚和热忱。……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为摆脱追捕的避难地。那些决心公开表明其信仰的基督徒们,却无法将他们留在自己家中,因为这会使自己要面临丧失一切的明显危险。”^⑥这一方面是对全国各地教友状态的描写,另一方面也适合用来说明福安教友的状况。

① 《福建延平府书成、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、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,会同福州府徐维垣审拟福安天主教事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40页。

② 《抱(报)诸友单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49页。

③ 《福安遭难事实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50~151页。

④ 《福建延平府书成、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、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,会同福州府徐维垣审拟福安天主教事》,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,第143页。

⑤ 这里应指的是公开踩踏圣像,向神像膜拜等。

⑥ 《尚若翰神父就中华帝国1746年爆发的全面教案而自澳门致圣夏欣特夫人的记述》,收录于杜赫德编,耿昇译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第四卷,第337页。

五 结语

与此前“福安教案”的相关论文比较,本文在史料的使用上,《流血记》代表了教会方面对此教案的叙述,而《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》中福建省内层级的档案,则提供了福安教案更细致的过程。透过这些新增史料,与原有史料互相补充及比对,使得“福安教案”的面貌更清晰明显。

我们可以说 1746 年的福安教案是一件特殊的教案,因为与乾隆时期的其他教案相比,1746 年的福安教案,是两件杀害传教士而不是驱逐传教士的案件之一。这两件案件并不代表乾隆皇帝有比其父亲更严厉的对天主教的政策,因为 1746 年福安教案的主导者是福建巡抚周学健。周学健个人对天主教的恶劣认知,是造成其用极端手段处理传教士的原因。

换一个角度看,我们也可以说 1746 年的福安教案是一个一般的教案。因为周学健的反教认知并非独有,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,都可以看到指称天主教有魔法邪术的说法;也有对于外国人的莫名恐惧及不信任,或是寻找各种证据,用以证明传教士居心叵测,担任其母国的间谍。类似的认知可以早推至 1616 年的“南京教案”、1664 年的“历狱”,或后延至清末 1870 年的天津教案、1900 年的义和团,甚至到 1950 年作为指控外籍传教士的罪证。这样的认知来自于传统文化,而历史记忆的沉淀与累积,也在其中扮演着催化与转变的作用。可以这样说,时至今日,这样的认知多少仍然存在。

另外,对于 1746 年福安教案的探讨,使我们对于此类教案的研究,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在福安教案的政治运作中,地方官员敢于在其呈报之审案记录中表现与巡抚不尽相同的意见,或可推想中国有优良官箴,人人皆以效法海瑞为荣;但更可能的说法是他们并不觉周学健所为是皇帝意愿,在上级和上上级之间,他们选择了上上级。正是因为如此,我们才能看到如此精彩的审案记录;也藉此记录,我们对福安的传教活动及教友群体,有了更多的认识。

在中国天主教史的叙述中,“教友”及“教友们”往往是被忽视的一群,在本文的描述中,教友们有了较清楚的面貌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环境,信仰的维持与发展,所遭遇的困难,以及在教难中所做的选择。可以这样说,每一次的教难,都是对教友信仰的严肃考验。

1746 年的福安教案,大致上未影响到同为福安县辖的罗家巷、顶头等教友点。教难主要发生在穆阳、溪东及福安县城。以 1939 年的教务统计资料,这一个区块的教友大概有一万一千人,是 1746 年的两倍多。^① 长时期来看,1746 年福安教案的记忆,透过《流血记》及五位传教士 1893 年被宣为真福,乃至 2000 年被宣圣,是现在这地区教会的光荣事迹,也是巩固信仰的凭借。但教难造成的打击,当然也使得不少教友放弃了信仰。^② 怎么评价,这就是历史学者根据史料要做的工作了。

① *Les Missions de Chine* (1938-1939), p. 381.

② 现在穆阳缪姓教友亦为数不少,但在他们的记忆中,他们多半是缪桂三的子孙,而缪桂三是在白多禄被杀后信天主教的。这有可能是事实,也有可能是对背教历史的遗忘,这个记忆也表现出不少缪姓教友因教难放弃了信仰。

中国基督徒对非基运动提出的“宗教非科学”的回应

段琦*

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受到最大的冲击有两次：一次是义和团运动，另一次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非基运动。这两次运动的共同点都是在强烈的民族意识之下“引发了东西方的冲突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外来文化的严重危机”。^①但两者也有很大的区别：义和团运动是由官绅领导，广大下层民众参与的反洋教运动，其反教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的夷夏之见和人禽之辨，采用的手段是暴力；非基运动（包括早期的新文化运动）领导和参与者，主要是众多的接受西方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，完全不同于 19 世纪旧式士大夫。虽然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，但所使用的反教指导思想则主要是西方启蒙时代的科学主义、理性主义、实验主义，以及西方的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，采用的手段也是以口诛笔伐等非暴力行为，特别是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时期，手段更为温和，学术性很强，后期的非基运动虽有某些暴力倾向，但与义和团不可同日而语。

非基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新文化运动中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西方启蒙思潮，特别崇奉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，即所谓的“赛先生”和“德先生”。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1915 年创办的《青年》^②杂志的

*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。

① Tatsuro and Sumiko, Yamamoto, "The Anti-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2-1927," *Far Eastern Quarterly* (Hereafter, FEQ) XII, 1953, p. 133.

② 该杂志第 2 卷起改为《新青年》。